

鸦片战争前的

东南四省海关

THE CUSTOMS IN CHINA'S FOUR SOUTHEASTERN
PROVINCES BEFORE THE OPIUM WAR

黄国盛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黄国盛 著

鴉片戰爭前
的
東南四省海關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黄国盛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3

ISBN 7-211-03626-5

I. 鸦... I. 黄... III. 海关—经济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F75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4772 号

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

YAPIAN ZHANZHENG QIAN DE DONGNAN SISHENG HAIGUAN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5.875 印张 2 插页 378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11-03626-5

F·194 定价: 24.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黄国盛同志的博士论文《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经修订后正式出版，为清史研究园地增添了一部佳作。

1982~1983年，黄国盛同志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学习。从那时起，他有志于清史研究。其后，他回到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从师于陈增辉教授，参加了增辉先生主持的《外国来华人名大辞典》的修订工作。这是国盛同志关注清代海关研究课题的最初缘起。

1985年福州召开林则徐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去福州参加会议，国盛同志和我谈了他对于清代海关与海军的“两海”研究的设想。福建既是“海关”的创始地，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国盛同志身为福建史学工作者，对这“两海”予以重视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且他了解当地情况，熟闻故老传说，易于收集史料，进行此项研究有更为有利的条件。从那以后十多年过去了，国盛同志一直致力于“两海”的研究。

1995~1998年，黄国盛同志从师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段本洛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国盛同志拜访了国内许多名家，查阅了大量档案、官书、方志、文集等资料。在这部博士论文中，黄国盛同志研究了清朝前期粤闽江浙四海关的设置，以及海关监督海关衙门的沿革、职权与机构以及对外贸易、政策税则等问题。内容充实，史料丰富，论点正确，颇有新意。

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近些年来颇受学术界注意。黄国盛同志

从四海关入手来考察清朝的对外贸易，角度较新，分析深入，能够提出一些有意义的看法。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虽有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偶然的，稀少的。中国处在东亚一隅，基本上与欧洲、美洲、非洲隔绝。从 17、18 世纪起，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进世界潮流的漩涡，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但这种联系是通过外国殖民主义海外扩张而实现的，中国因此而深受其害，付出了重大牺牲。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给中国造成苦难、屈辱的殖民主义一去不复返，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宣告了殖民主义的永远结束，而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却在不断加深，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正澎湃于全球。在这新世纪开始之际，回顾清朝前期对外贸易的历史，反思中国卷进世界潮流的进程，探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世纪中华民族如何建设经济、如何奋发自强、如何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是具有启示意义的。际此 2000 年之元旦，追昔抚今感慨系之，爰书数语，以为序言。

戴 逸

2000 年元旦于北京借来斋

Preface

Huang Guosheng's Pioneering study of the Qing maritime customs in the pre-Opium War period is a remarkable work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synthesis. This masterful institutional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provides a holistic view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operational features of this important institution in all of the four south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its origin and maturation from 1684 to 1830. Whi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generally centered on the customs and trade in one specific port or a single discrete coastal region, Huang's work enables one to see the operational coherence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 and its critical importance in linking, stimulating, and integrating maritime trade on the coast and its extension oversea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The book sheds new light on the innovative role of the Kangxi and Yongzheng Emperors as skilled institution builders. It is clear from this research that these two emperors carefully crafted the maritime customs to insure the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the coastal region and its population whose livelihoods depended on plowing "fields from the sea". They designed the customs to implement Qing maritime policy—a policy that sought to achieve pacification through prosperity. This policy reflected the early Qing emphasis on stewardship of the coastal e-

conomy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security. The customs system was a tool of Qing maritime policy, and its systemic coherence created the conditions that led to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the commercial and commodity economy on the coast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coastal region into the empire. Yet, at the same time, Huang shows that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the Qing linkage between economic well-being and security that led to periodic restriction of foreign trade ultimately emerged in the mid-Qianlong reign and acted to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mestic and overseas trade after 1756.

Professor Huang's scholarly work is also significant for its thorough treat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Qing maritime custom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itime trade and shipping. He shows how the expansion of the customs networks in each of the four maritime provinces and the creation of branch collection, inspection, and patrolling stations fostere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lusters of smaller ports and their economic hinterland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ional and regulatory coherence of the customs system sparked the enormous expansion of inter-provincial maritime trade extending to the northeastern ports. As a result of the explosiv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maritime trade and shipping on the coast, this region emerged as the lynchpin of Chinese trade and shipping networks that extended to the interior and overseas and gradually pulled the "natural" agrarian economy seaward.

Professor Huang's study has important revisionist implications for scholars of Qing maritime history,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West. First, this work challenges “orientalist” clichés that characterize Qing management of maritime trade and security as backward, irrational, and inefficient. Second, it corrects the Canton-centeredness of Western scholarship that emphasizes European trade at Canton in the post-1756 period and, consequently, fails to see foreign trade and the Canton system as but one part of a larger dynamic coastal trading system whose origins date back to innovations in the Kangxi and Yongzheng reigns. Finally, this work draws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PRC scholarship on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and the need to increas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between scholars in the PRC and abroad. Then works of scholarly excellence, such as Huang Guosheng’s study of the Qing maritime customs, will find a wider and welcoming audience overseas.

Jane Kate Leonard

(Ph. D. Cornell University 1971)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Akron

前 言

自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是人类社会在世界范围里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国也不例外。一方面，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趋向没落；一方面，中国社会又面临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在这样的条件下，清代的“海关”应运而生。至鸦片战争前夕，清代主权完整的“海关”，存在了约一个半世纪。

自康熙朝设置东南四省海关起，中国社会闭关与开关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始终表现得特别尖锐。这是涉及民族兴衰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认识清代前期闭关与开关的状况及相互关系？清代前期东南四省海关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度？清代前期开海设关有何成就、有何教训？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为学术界所高度重视。对其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演变状况、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贸及管理制度的演变状况；而且，探讨与揭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蕴藏于深层的运动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代的改革开放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本课题，国内著名历史学家已作过许多精辟论述。如：戴逸先生在《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乾隆帝及其时代》等论著中，深刻地分析了乾隆中期前后清政府由“对中外贸易的限制尚少，态度比较宽容”到“限制措施逐渐严格，趋于周密”的原因与教训。^①汪敬虞先生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

^① 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略》、《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等著作中，对鸦片战争前中西贸易的形势、变化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翔实而深入的研究。^① 杨国桢先生在《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等论著中，倡导要重视研究“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并指出：“海洋是滋养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源泉，所有海洋沿岸国家和地区都概莫能外”；“事实上，中国比西欧更早环抱海洋，有自己的传统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②等等。上述史学前辈的研究及学术界的其他相关研究，为本课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

长辈的治史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历史发展进程的错综复杂和内容的无比丰富，要求史学工作者不能对历史仅作简单的是与非的评论；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人类以往的活动尽可能进行多层面的、历史的和系统的考察。本论文即试图对研究对象作一次多视角、多层面透析的尝试。依据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及其特点，在考察清代海关的发生与演变过程时，至少有五个重大因素或观察层面不容忽视。

第一，国家统一对开海设关的影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随即宣布结束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并设置海关。统一台湾与开海设关绝非偶然巧合。国家统一是开海设关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国家统一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重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2期）、《关于东印度公司同散商关系问题及其他》（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54～6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

② 杨国桢：《明清东南区域平原与山区经济研究序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等。

大。国家若无统一，海禁必将延续。而清代前期海关的发展过程，又曾经是中华民族门户加固的过程，是中华民族空前统一的一种标志。遗憾的是，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外部势力的入侵和清朝政权的腐朽，海关门户与国家统一逐渐双双遭到破坏。

第二，人类世界历史的形成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关系。戴逸先生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作用就是使各个地区靠近起来，进入一个世界体系，就像马克思所说，它迫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按西方的面貌改铸全世界，这是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全世界或迟或早都发生了历史的转轨，即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撞击下发生改变，打破了常规和平衡，进入了动荡的斗争和变革之中，激发了自立自强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转轨的历史。”^① 明末清初及之后，正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人类世界历史的形成与中国历史进程之间，呈现了一种相互影响的极为复杂的关系。清代的开海贸易，客观上适应了人类建立相互联系的总趋势。此后的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部分。清代前期曾对外商实行过优惠招徕政策，中国海商亦参与全球市场的构筑。中国既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场所，亦明显加快了自身转轨的进程。这个时期，世界影响了中国，中华民族亦对人类近代文明作出过贡献。但 18 世纪后半期以降，中国社会之发展，开始逐渐落伍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进程。当西方殖民主义的暴力掠夺政策占据上风之时，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转轨方式便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

第三，清代前期是中华民族开发海洋经济的关键时代。东南

① 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载《清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沿海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海洋经济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杨国桢先生认为：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① 中华古文明中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在传统农业的大框架下，沿海地区“存在海洋性的小传统。事实上，中国古代向海洋发展的小传统始终没有被割断，只是表现时强时弱而已。汉唐以来，海上交通、海上贸易、造船和航海技术、海上捕捞和海盐制造等等，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② 杨国桢先生还指出：“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③

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海洋经济的孕育与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承接远古至唐、宋、元、明各朝的发展态势，清代前期海洋经济的开拓与发展，无疑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清代前期，沿海区域农业的进一步开发，沿海区域

①③ 杨国桢：《明清东南区域平原与山区经济研究序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2期。

② 参见杨国桢、郑甫弘、孙谦：《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第1~1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手工业的发展,沿海各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海上交通、贸易及向海外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之状况,等等,都出现了有别于前朝的新的特点。

海关之设,海上经贸管理体制的变革,正是中华民族正式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海洋经济历史时期的标志。

第四,清代海上经贸管理制度的沿革及其影响。经济制度亦有其自身的某些变化规律。本课题有必要系统考察这时期海上经贸管理制度演变之来龙去脉。除了追本溯源、勾稽流变之外,还应着力探明这一制度在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变革的情况、推动变革的原因、成效及历史局限,等等。

第五,清朝封建政治制度对开海设关的消极制约作用。在人类社会转型的时代,大清王朝亦曾有过作为,曾经采取过某些顺应潮流的重大举措,客观上推动过海上经贸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建立在内地庞大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具有异常坚固的特性,其对海上经贸制度的消极制约作用显得特别突出。尤其在历史发展的紧要时期,清政府对世界潮流反应迟钝,改革步履艰难,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甚至不惜作茧自缚,试图重蹈闭关之旧辙,以至于决策失误,严重拖累了中国历史转型的步伐,其教训极其深刻。

总之,清代海关的产生与演变,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或制约。因此,我们有理由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以避免从重大历史课题中得出简单化或过于片面的认识。这或许可以成为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所作的修订稿。

本论文的撰写,承蒙导师苏州大学段本洛教授精心指导。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专程拜访并荣幸得到国内如下知名专

家学者的指教与帮助。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汪敬虞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胡绳武教授、林敦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陈诗启教授、陈支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夏东元教授，上海复旦大学陈绶教授等。笔者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资料线索上得助于他们的重要指教，还直接受益于他们的学术思想。如，戴逸先生认为乾隆中期以前对外贸易限制尚少，态度比较宽容，其后限制措施逐渐严格，趋于周密。汪敬虞先生认为，清代前期，清政府的改革措施往往是被动实行的。胡绳武先生认为，经济问题不宜仅从经济的角度去观察，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角度看，清政府缺乏主动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愿望和能力。龚书铎先生认为，西方学者的“西欧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观”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片面之处。杨国桢先生认为，确定广州一口为西方商人的指定通商口岸，此后广州的发展是以牺牲江、浙、闽数省的发展前景为代价的。陈诗启先生认为，清政府没有解决好开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倘若解决得好，鸦片战争未必会爆发。本人深受上述重要学术观点和其他学术思想的启迪，并融会贯通于写作之中。

借此机会，我深深感谢学长汪征鲁教授对我的长期关爱。早在1989年他就完成了博士学业，他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出版时修订至90万字，获福建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尤其对与他长期共事的同志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不仅仰慕他的治学经验和成就，亦钦佩他的学术胸怀和开拓大业之气魄。毫无疑问，倘若我在学术事业上也能有所收获，这与征鲁学长的长期鼓励与热心扶持是密切相联的。

我衷心感谢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为本书作序。1982～1983年我有幸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学习。从那时起，我一直得到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胡绳武教授、林敦奎教授、王

道成教授和林克光教授的关怀。正是1982年，我选定了毕生从事史学研究的方向——清史领域。戴逸老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对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还要感谢美国阿克伦大学 Jane Kate Leonard（林珍珠）教授为本书作序。1998年6月我赴香港参加由李金强先生等举办的《近代中国海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题为《清代前期的海关口岸与内外贸易》。该论文受到与会 Jane Kate Leonard 教授的重视。此后，她热心地将我的相关研究介绍给了她的同行们。1999年四五月间，Leonard 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她特地从北京来福州与我进行了有益的研讨。1999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1750~1850年海洋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经她推荐，会议主席吴振强（Ng Chin Keong）教授邀请我参加了会议。直到现在，Leonard 教授还在翻译我的相关论文。让我感动的是：一次偶然相识，竟使我后来得到了她这么多的帮助，并且还与我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Leonard 教授与我的合作，得到了我所在母校校长曾民勇教授和历史系主任汪征鲁教授的鼓励和支持。

本书出版之际，我深切怀念已故恩师陈增辉教授。1983年以后，我参加由增辉先生主持的《外国来华人名大辞典》的修订工作。我在增辉先生指导下具体协助修订海关、商人两部分内容。这是我从事海关研究的缘起。由陈增辉先生和秦国经先生领衔编纂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出版后，增辉先生的老朋友——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致函说：“在每一个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治学严谨的学者书架上都应该摆着《年表》这本书。”1985年福州召开林则徐研讨会期间，戴逸先生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特地访问了增辉先生的研究室，对他的工作也给予高度评价。增辉先生严谨治学、友善待人的师德，是我一生都

要讲求的。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王国平教授和俞政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林金水教授、林庆元教授、程镇芳教授、陈贞寿教授、范启龙教授给了我许多鼓励和重要帮助。我还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黄汉民研究员和张忠民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晓望研究员、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与黄顺力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郭豫明教授和周育民教授的热心帮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领导和老师们为本人查阅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还有许多领导、老师和同事给予了我很多关怀和具体帮助。借此机会，本人谨向导师和所有鼓励、关怀、指导和帮助过我的著名前辈学者、领导和师友们表示诚挚地感谢。

我同样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领导和林斌先生，他们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林斌先生审稿非常仔细，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本书承蒙福建师范大学“陈德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亦谨致感谢！

黄国盛

2000年初于福建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清代海关创立的背景与设置经过	(1)
第一节 明末清初对外经济交往的状况	(1)
一 明末清初海上华商力量的兴起	(1)
二 明末清初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接触	(5)
三 明代后期的海上贸易管理制度	(10)
第二节 康熙朝创设海关的动因	(11)
一 清初的“海禁”及其影响	(11)
二 开海设关之酝酿	(12)
三 开海贸易的前奏——展界	(15)
四 康熙帝创设海关的直接动机	(17)
第三节 四省海关设置的经过	(21)
一 四省海关设立的时间	(21)
二 海关衙门设置的地点	(23)
小结	(38)
第二章 海关监督	(40)
第一节 海关监督沿革	(40)
一 康熙朝对监督的任用	(40)
二 雍正朝巡抚对海关的兼管	(47)
三 乾、嘉、道各朝海关监督沿革	(49)
第二节 海关衙门组织结构与编制	(52)
一 笔帖式之派遣	(52)
二 浙海关衙门“四房”之设及衙役编制	(53)